



远足

□ 夏志强

童年时的春游叫远足,我印象最深的是五年级那次远足。

远足前一天,在早晨举行升旗仪式时,学校刘校长站在砖砌的司令台上,宣布明天中高年级同学组织春季远足,操场上立刻响起掌声和欢呼声。

这次远足的目的地,是家乡周庄南面的一个叫祁沟的村庄,路程大约四里多。出发时,排的是两路纵队,经过庄南头那座又长又窄的木桥时,为了安全,就变成了一字长蛇阵。过了桥就进入了农村,走在田间五十厘米宽的小路上,和煦的阳光,湛蓝的天空,悠悠的白云,随风飘拂的柳枝,令人心旷神怡。粉红色的桃花,洁白的梨花,金黄色的油菜花,紫色的蚕豆花,还有大片大片绿油油的麦苗,五彩缤纷,美不胜收。偶尔有一两只小燕子像黑色的闪电一样从头顶掠过,引起我们一阵小激动。路旁还看到几个池塘,一种叫苍鹭的水鸟伫立在池塘边,腿又细又长,喙又尖又长,时刻准备着对水里面的小鱼小虾发动突袭。一群一群指甲大小的小蝌蚪,拖着长长的尾巴,摇头摆脑地游着,挺惹人喜爱的。我立刻萌生了一个想法:等到星期天,约两个同

学,带个玻璃瓶来,捞几个小蝌蚪回去养,看看它是怎样由一条尾巴变成四条腿的,怎样由一个呆头呆脑的黑色小蝌蚪变成一只活蹦乱跳的绿色青蛙。

途中,还不时看到忙着春耕的农民,他们一手扶着犁耙,一手扬着牛鞭,打着牛号子在犁地,以便做秧田,播种育秧苗。看着他们光着小腿,在冰冷的水田里一步一步艰难地跋涉着,才真正体会到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啊。

到了祁沟的庄头口了,路两旁各有一棵一人抱不过来的大杨树,上头各有一个喜鹊窝。可能是我们这一大群不速之客惊动了它们,几只花喜鹊在窝旁的树枝上,撅着尾巴跳来跳去,“喳喳”地叫着。班主任王老师笑着问我们,“你们谁知道喜鹊在说什么?”“喜鹊还会说话?难道成精作怪了?”我们一脸惊讶地看着王老师。王老师悠悠地笑着说:“它们在说,欢迎欢迎,你好你好!”知道王老师哄骗我们,还是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,惊得喜鹊全飞走了。

到了这次远足目的地——祁沟小学,我们按年级坐在操场上休息。祁沟小学的老师早已为我们烧好了两大桶开

水,每个同学分到一搪瓷缸开水,拿出带的干粮,吃了起来。那时没有面包、蛋糕什么的,连饼干都少见,带来的大多是烧饼、方酥、金刚蹄、锅巴等,水果、饮料更谈不上,带了几个洗干净的荸荠、水萝卜就算高级享受了。

吃过午饭,老师们聚在一起抽烟、喝茶、闲聊着。学生们可闲不住了,女同学围成一个个圆圈,玩起了“丢手绢”的游戏,“丢手绢,丢手绢,轻轻地丢在小朋友后面,大家不要告诉她,快点快点抓住她……”歌声、掌声、笑声响彻校园。男同学最喜欢的是“斗鸡”,那是一项比体力、比勇气、比技巧的能充分体现男同学阳刚之气的对抗性活动。两个人面对面站着,两只手抱着一条腿,膝盖头像大炮一样对着对方,一条腿金鸡独立站着,相互剧烈地撞着,一番较量后,谁的手离开腿,抱着的腿着地了,谁就输了。两个人后面,都有几个平时玩得好的哥儿们为其呐喊助威,“加油,加油!”引来众多同学围观。

“瞿——”一声拉长的哨声响起,尽管意犹未尽,这次春季远足结束了。整好队,各班班主任检查过人数后,队伍按原路返回学校。

春游也好,远足也罢,是人们为了放飞自我,与大自然来一次亲密拥抱。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无私奉献和慷慨馈赠,要懂得感恩,懂得珍惜,懂得保护。不仅是为了自身,也是为了子孙后代。

“红色课堂”记忆

□ 蔡明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我到高邮吴堡中学读初中,每学期都有一两次“革命传统教育课”,请相关人士宣讲民族苦难史、革命战争史,全体师生参加。今天来看,就是接受“红色课堂”教育。

邓广和是周山居河大队一个普通农民,日本鬼子侵占高邮之后,他无辜被抓去,受尽了严刑拷打,也查不出个名堂,结果被草菅人命的小鬼子拉到高邮城东门宝塔旁的荒郊野地砍头。前面的三名新四军战俘英勇就义,邓广和排第四个,只听得小鬼子刽子手双手举起大刀“嗷”一声吼叫,就感觉到颈部被重重一击,顿觉天旋地转,不省人事,倒在血泊中。孰料这一刀竟未伤及气管和颈动脉。行刑后,小鬼子擦拭完刀得意地扬长而去。也不知过了多久,在秋天阴冷的霏霏细雨中,邓广和苏醒过来,忍着剧痛爬靠在宝塔边,撕衣缠住血染的脖子,踉踉跄跄奔到几里外,撞开一亲友家的门,当夜从叫“牛缺嘴”的地方雇了一条船偷运回老家,躲了起来,侥幸逃过一命。当时,邓广和讲到痛心处,老泪纵横,哽咽着走下台,掀开衣领把脖子上的一道长长的深褐色刀伤疤痕展示给全场。师生们群情激愤,声讨日寇的口号声震耳欲聋。

一个春日午后,红旗开道,彩旗校旗跟进,我们一路歌声来到学校东南七八

里一个叫邵大驴拐子的地方,说是凭吊古战场。只见两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在此呈十字交会,河面较宽,沿南北向河西堤跨过东西向河流,有一条长搭板木桥,过桥右首西南处有一烧砖瓦的土窑。当地民兵营长领着我们介绍说,三十年前,一支北上的新四军部队在这里与小鬼子扫荡队意外遭遇,新四军人多,鬼子武器好,双方打了不到一小时,鬼子逃进了土窑顽抗,想等待援兵。新四军涉水过河迂回到北岸,打死了土窑顶的鬼子机枪手,又匍匐到土窑近处,扔进去手榴弹,消灭了鬼子。徜徉在土窑前,流连在大河边,我们每个同学仿佛穿越时光隧道,置身战场,耳边有子弹尖叫呼啸,眼前腾跃起新四军战士英勇冲锋的高大形象,心中不禁萌发出投笔从戎的报国愿望。

吴堡中学地处周山公社地域,而周山烈士是牺牲在高邮我党我军最大职务的领导同志。下放在营南老家的省卫生厅副厅长吴越徒步十几里来到我校,作为战争年代中共界首书记,解放后高邮第二任县长、周山烈士当年的部下,他的报告把我们带进了那艰苦卓绝的烽火岁月。

周山是苏中军分区敌工部副部长,主管清特肃奸工作,鉴于高邮地处敌我拉锯战的最前线,敌人势力强大,还乡团

猖獗,就主动请缨带领一支重建的有三十多人的县区干部工作队,外加一个连的部队掩护,在1946年12月24日夜,从宝应夏集越过子婴河,悄悄插进界首区的周家垛(解放后隶属周山公社),不料被敌密探发觉,报告给王营炮楼里的敌军。先来了一个营还乡团,仗打得很胶着,后有路过的敌黄百韬整编二十五师增援,满地都是“黄狗子”,敌火力又猛,我方抵挡不住。周山命令大家向东南草荡撤退,自己带警卫班断后,后在过河时不幸溺水牺牲。吴越与他的通讯员突围时,被敌机枪封锁在桥北岸,听到敌机枪换弹夹的“咔嚓”声,吴越一招手,说时迟那时快,两人一前一后几秒钟冲过了长木桥,侥幸突围成功。这一仗,我方损失重大,很多同志牺牲、被俘。县委宣传部长狄奔腿部中弹,被敌刺死。界首区区长翟光退守民宅,在大火中英勇就义。1947年后又有反扫荡战斗中牺牲的县委书记李健、被俘后英勇不屈的县长周奋等,其革命豪情气壮山河,感人事迹可歌可泣。因为都是亲身经历,加之长期作领导工作,五十上下的吴越从不看手中的讲稿,思路清晰,声音洪亮。每每讲到烈士们牺牲时,他总眼噙泪水,慢慢掏出方格手帕轻擦。我们不仅了解到那段地方革命血与火交织的斗争史,也深深感受到同生死共患难浓浓的战友情。

后来,这样的活动还有很多,内容形式也丰富多彩。赓续红色血脉,继承革命传统,就像一颗种子,从此深深扎根在我们的心中。

潘医师

□ 黄士民

的大多是熟人,一是靠近医院的老街坊,二是经熟人介绍前来就医的。潘医师看带状疱疹小有名气,这个病很痛苦,中医、西医的疗法手段不一样,潘医师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,既有传统的针刺疗法,又借用西药消炎杀菌,更拿手的是以针灸疗法,减轻病人的后期疼痛。他的手法十分娴熟,点穴穴道尽在掌控之中,小小银针被他拨弄得服服帖帖,头部、肩部、手掌、脚面,根据患者的病灶精准下针,几根银针顷刻之间便顺利抵达目的地。一个下午,一位二十来岁的小伙由母亲领着来找潘医师,称前一天晚上吃饭后便开始打嗝,两三分钟来一次,直至第二天午饭后依旧如此,胸口都连带疼痛。潘医师拿起一包银针,

熟练地抽出两根,对准患者的前额部位顺势而下,第一针,悄无声息,第二针,只听见小伙子“啊”了一声,间隔一分针,说不打嗝了。这么神奇,刚刚来时还接二连三地打嗝不停,两针下去,停了,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还真有点不相信。后来量血压的几天,亲眼目睹手伸不开的、腰不能直的、嘴有点歪的,都在潘医师的妙手下得以康复。潘医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他对待每一个患者的诚恳和耐心,他说病人最希望医生给他讲到位,医生的话对患者很重要,既要认真诊治,也要健康疏导,有时候,医生的一句话能唤起病人的信心。找潘医师看病的总说这样一句话,潘医师人好吧,我觉得这是对他最大的褒奖。

我问潘医师,一天忙到晚,最多接待几十个人,很累吧。他坦诚地说,很累,也想歇歇,但医院人手少,患者有需求,我只有挑起担子。看到被他医治好的患者一个个眉开眼笑,潘医师挺开心。

我的父亲

□ 潘万余

父亲是个一点就着的火爆脾气。我没当兵前,他在我的记忆里是个严父。小时候顽皮,炎热的夏天总会呼朋唤友下到池塘里游泳。家乡潮河沟渠遍布,每年暑假都会有小孩因家长看管不力,淘气游泳而溺亡。所以,每回只要发现我下水,父亲总会火冒三丈,不由分说拖上来就是一顿暴打,搓衣板也跪过几次。

父亲也是个开明的慈父。那时家里穷得刚刚能维持温饱,我上高中时已经是1989年了,但每年庄稼青黄不接时,我住校回家“补给”,父亲仍然只能咬牙去相对宽裕的邻家借钱。所以,一周五元钱的生活费,我是精打细算着花,每回学校食堂打饭时,看到别人吃肉丸,我咽下口水照样倔强地去啃馒头、嚼咸菜。就是这样,父亲还是坚持着让我和哥哥上完了高中。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,那时的我和哥哥学习都很用功。父亲不识字,学习上也不多问,但他常对我们说的话“只要你们愿意上,就算砸锅卖铁,我也会供”,一直激励着我们。哥哥顺利地考上了警校,我也在空军飞行员招收中,一路过关斩将进入政审和复试。正当我憧憬着翱翔蓝天时,一次意外却斩断了我的蓝天梦:骑车不小心摔骨折了左脚小趾。在老师、亲属的指责下,一向要强的父亲低下了头,我知道这不是父亲的错!夜深人静的时候,我一个人偷偷躲在被子里哭泣……

也许是发现了自己身体的潜能,也许是为了逃避父亲内疚的眼神,更是为了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,我毅然报名参了军。在欢送的人群里,父亲魁梧、高大的身躯尤其醒目。怅然与无助忽然袭上心头,头脑一片空白,和家人说了些什么,怎么道的别,我已经想不起来,只看见父亲的眼里也噙满了泪水。

军旅生涯里不知吃了多少苦,我在心里一次次告诫自己:要加倍努力,把自己最光鲜的一面呈给父亲。连续三年优秀士兵,第二年当班长,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顺利地考上了济南陆军学院。我能够想象得出父亲在家看到敲锣打鼓送喜报的村干部时的情形。

难得的探亲机会,无论我是几点到家,父亲总会和母亲一起坚持着等我踏进家门才肯去睡。半夜里,他还像我小时候在家时一样,悄悄帮我拉下因翻身蹬腿上去的衬裤裤脚。因为他一直认为,裤脚皱上去睡觉会不舒服。

娶妻生子,转业从警,有了自己的房子后,父亲来济和我们长住了一段时间。每天下班回家,看到父亲和母亲在客厅看电视,妻子在厨房做饭,女儿在书房做作业时,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!由于过惯了田间地头、养鸡喂鸭的生活,加之语言不通,没有自己的一帮老朋友在身边,父亲坚持要回老家。拗不过他,和妻子一起开车把他们送到高速路口。返回家中时,望着空空的房间,我抑制不住泪如泉涌,吓坏了的妻子默默地抱着我。

不知不觉中,父亲已年过八旬。他一向身体很好,也很注重锻炼,每天早晚都要出门大步走上近一小时。有几十年烟龄的他,经不住子女们的轮番劝说,毅然决然地戒了烟。看到身边那么多人因戒不了烟而痛苦,我就特别佩服他。2010年,父亲患上了皮肤病,但由于发现得早,经过手术已经基本康复。父亲的病情,除了我和哥嫂外,家里其他人都不知道,包括父亲本人。2011年,母亲因食道癌住院治疗,我们几个子女商量好对父母隐瞒病情。见子女们孝顺团结,父亲成天乐呵呵的。一向当甩手掌柜的父亲,居然做饭、摘菜、养鸡、种菜等家务,样样无师自通。我常跟他开玩笑:“上半辈子妈妈照顾你,现在你得还账了!好好干!”

母亲的病情极不稳定,放疗持续时间长,并且隔段时间就得去扩管和复查,最后被医生告知住院禁食,那种痛苦无以名状。为了让父亲宽心,母亲从来没有守着他落过一次泪,直到最后用上杜冷丁时,她都没有当着父亲的面喊过一声痛。倒是父亲觉察出异样后,一次次哭泣着叫我们一定要尽力给母亲治。在家陪床的那段日子,由于母亲已经咳嗽不止,我们基本一晚只能睡三小时左右,多次劝说父亲到其它房间去睡,他却一直执拗地选择陪伴着母亲,直至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2013年3月,刚刚松口气的我们,忽然又被父亲腰椎间盘突出急性发作弄得乱了手脚。二姐告诉我:父亲痛得一个人在家哭,带他去苏北人民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,针灸吃药治疗,但情况越来越糟,父亲已经不能站和坐。哥嫂果断决定送他去上海做手术。我赶到医院时,父亲的手术已经成功完成。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和大姐夫留在上海陪床。父亲因为神经反跳,下身酸胀,几乎整夜不睡,我们交替着给他按摩、捂捂热毛巾。天天喂他吃饭,给他洗头、洗澡,我都吃惊自己在亲情面前竟能如女人般细心。

哥、姐说父亲是个“老小孩”,我也在陪床这段时间坚信了这一点。父亲难受烦躁时,会冲我们发脾气,会因半夜我们两人都睡着了,没有过问他而生气,最离谱时他居然半夜自己偷偷地拔尿管,但事后他又都会给我们道歉赔不是。那天他自己拔尿管被我发现制止后,我狠狠地“教育”了他一通。父亲稍稍好些,能够扶着东西站立后,我实在因工作,抵不住内心对领导和同事的愧疚,返回了济南。离开病房的一刹那,分明看到了父亲无助的眼神中噙着泪花,我忽然很后悔:当初说他的语气重了些,找个机会再给他道歉吧……

恍恍惚惚间,我仿佛又回到了父亲的身旁,给他捶着腰。父亲也还像我小时候一样,生怕累着我,没过一会儿便挺挺自己的腰,连声说:好了,好了……

最近血压有明显波动,且多次出现非正常数据,在家一天测三次,依旧居高不下。就近去了家附近的城南社区医院,扫码测温入院,挂了全科门诊。看见紧靠大门旁第一个全科诊室门外候诊的人挺多,按常规思维,估计这位医生不错,至少有这么多人愿意在门外等候。进入诊室,只见坐堂医生一副很精干的样子。瞥了一眼工号牌,潘志明,副主任医师。说实话,对全科门诊我多少有点不那么相信,一个医生,什么病都看,专业化程度和大医院相比可能会有较大差距。潘医师听我一番陈述后,帮我测量完血压,说血压确实很高,得先控制血压。在问我正常服用缓解高血压药物情况后,他耐心地给我分析造成血压高的综合原因,诸如劳累、压力、药物长期服用形成的依赖抗药性等,提出解决方案一二三,说明理由,强调重点,言简意赅。潘医师语速偏快,但语气特中肯,给人信任感。

后来几天,我发现来找潘医师看病